第一章　清朝末年的山东师范教育

（1902—1911）

山东现代师范教育诞生于清朝末年，这是由其特殊历史原因决定的。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衰败腐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瓜分和掠夺，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正是在此背景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直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迫使清王朝不得不放下架子，实行新政，开办新教育，以期通过广育人才，图强自立。可以说，是贫弱的社会现实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为山东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顺应时势，山东不仅以开办山东大学堂而领省办大学风气之先，就师范教育而言，继江南部分省份之后，亦列出师范一科，选派生员赴日本及其他地区学习先进师范教育理论。初创的齐鲁师范教育不但以先进的理念和师范意识开山东百年师范教育史之端绪，也以其特有的先导性为整个山东教育奠定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基础。

第一节　山东师范教育的历史传统

山东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人类的蒙昧时期一直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字时代，特别是在夏、商、周时期，山东大地一直都处在华夏文明的最前沿；加之我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孔子就诞生在齐鲁大地，孔子及儒家学派所创立的教育学说，不仅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教育的主体思想理论，更倡导营造出极浓厚的尊师重教风气。一直到今天，此种历史传统对山东师范教育仍具有重要影响。

一、山东师范教育思想历史溯源

教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职业。正是他们以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和人类生命意识薪火相传，才使得民族文化得以流传至今，并推动人类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历史阶段。作为培养教师的中国师范教育虽然正式产生在清末，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既然教师古来有之，当然便有教师的造就之地和培养方式与培养过程。虽然我们没有将其冠以师范之名，但决不可否认这个过程或者培养方式的存在。

我们从师的历史源头来研究“师范”的涵义，可以发现，师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之前。韩愈在《师说》中曾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因为既然有教与学，所以就必然有师的存在，只是我们今天已难以确考罢了。在夏、商、周时期，教师不是一种社会职业，而只是一种社会职能，所以他们的由来不是按照教师职业意图和过程来培养的，从师范的概念内涵来说，从师的培养机制上来说，只能说这是我国历史上师范教育的蒙昧无意识时期。

至春秋之后，严格地说是孔子创办私学之后，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培养教师为目的之一的教育，而它恰恰就诞生在齐鲁大地上，这不能不说是山东的历史荣耀。

虽然当时孔子等人没有用“师范”一词来予以表述，而且他也没有系统论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实践中，特别是他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的事实来看，孔子的确可以视为我国教育史上最早培养教师的代表人物。如他曾告诫弟子“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尤其他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整套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理论体系，不仅为山东，亦为整个中华民族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思想之先河。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一分为八，“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他们从不同角度，采取不同方式，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掀起儒学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先秦时期与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学派，也诞生在齐鲁大地。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独树一帜，甚至与儒家学派分庭抗礼。墨子成为学术史上第一位批判儒家学说的思想家,他曾说“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表明了他对教师作用的重视。虽然墨子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大师，在其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集团，但自秦汉以后，墨学便成为绝学，在教育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战国时期的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又一集大成者，据传他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游说于诸侯，并发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人生一大乐趣的感慨，晚年又“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成为诞生在齐鲁大地的又一位教育大家。荀子也以孔子的再传弟子自居，在齐都的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培养了大批治国之才，如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和韩非皆出于他的门下,而他所提倡的“下之亲上,欢如父母”“上之子下,如保赤子”，则成为中国传统师范教育思想中尊师爱生的基本要求。

总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一代代圣贤以其教育思想和培养师资的实践，为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天尊师重教历史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秦代既废官学，又禁绝私学，试图“以吏为师”，通过社会教育来取代学校教育的职能。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随着官学和私学的发展，师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但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孔门之风，而是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师业传授”的模式。为研习和传授经学，当时在国学中置有博士，地方官学称经师，且汉代早期所置博士大多出自于山东，以他们为核心或从他们出发，造就出一代又一代传承经学的“师”儒人才，然后流布四方。官学与私学两大阵营中，私学教师没有公职职称，弟子和社会的人们均称之为“师”、“傅”、“先生”。他们后来成为培养以传经为职业的教师的主要力量，培养经师的方式有“登堂”、“入室”等多种。据《后汉书·郑玄传》记：山东大儒郑玄由于学识渊博，“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曾详注过《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等经书，在全国享有极高声望，因此不仅“齐鲁间宗之”，而且他客耕东莱时，学徒相随已数百千，60 岁时又有“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郑门成了远近闻名的师儒培养之地。据载，汉代山东远不止郑玄，以育师为业、坐坛授徒的大有人在，使山东在师儒培养上继春秋时期之后，不仅人员更多，范围更广，科类更具体，方式方法也更多样化，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自汉代以后，封建社会尽管朝代更替，但经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则无大的变化，基本沿着汉代齐鲁儒生所定型的师儒培养模式，一脉相承，直至清末。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道武帝初年立太学，置五经博士，齐鲁之邦也曾有过短暂的教育兴盛，所谓“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但此后却逐渐衰落，成为教育的弱势地区。以书院为例，唐宋以后，书院成为教育的主要阵地，是一个地方教育和社会文化水平层次的标志，自然也是社会高水平人才培养包括教师培养的重要场所。据《中国书院史》等书记载，唐代全国书院有几十所，山东只有 1 所，宋代共有 397 所，山东只有 24 所，别说比江浙，就是比安徽、河南也少很多。由于教育上整体的衰退，自然无法产生类似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时代巨擘，而只能沿袭前人，持守儒家学派千百年来不变的教育程式。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二、孔子“为师”思想及其影响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私学“师祖”。孔子创办私学，虽然主张“学而优则仕”，其门下也确实有几个弟子曾做了“相”、“宰”之类的官职。然而就其弟子们的总体去向而言，更多的则是如他一样聚徒讲学。据载：曾参、子夏、子游等人在师从孔子的同时，一面作宰为官，一面教授学生。孔子死后，弟子们更是各聚门徒，《吕氏春秋·当染》载有：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以至于后来分为八派，成为社会上以孔门为中心的一个巨大教育团体势力。正是孔子这种培养弟子为师的实践，加上他对“师”“儒”职业的诸多思考，使其教育理论体现出鲜明的师范教育萌芽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师”，是伴随着官学解体和私学创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产生的。因孔子在历史上被誉为创办私学最早的人，后人将其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通过实践总结和职业思考，孔子还创造出全新的教师说。在他看来，教师就是专门从事教育的人，是“诲人”者，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取，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之也。”其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堪称对教师的经典表达。颜回曾对孔子作了全面描绘，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将孔子视为“师’的典范。由此可见，儒家学说所说的‘师”，首先是具有较高深知识的人，其次是职业“诱人”，再次所授内容为“礼”、“乐”。或许‘师’刚从“官师’脱胎出来的缘故，孔子对“师”的解释不局限于师与弟子之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认为只要能教诲于人，使人能随其受到教育的人，都可称之为“师”。虽然存在着概念泛化的问题，但这也正反映出教师概念早期确立的实际情况。孔子对于教师的理解，成为后来中国教育史中“教师”一词的基本内涵，从《周礼》中的“是师教人以道者为称也”，到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再到孙中山“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退进，故教师之现任甚大”，一直到今天对教师职业的理解，都是一脉相承的。教师就是专门从事教育职业的人，这是理解“师范”教育的主体。

不仅如此，在孔子看来，教育作为一种“成人”事业，作为施教者的教师，尤其要加强知识与道德两方面的修养。

关于知识，孔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认为只要注意学习先代知识并从中有新的体会和了解的人，就可以为人师。它揭示出师的培养和造就应该不断地强化知识学习，从而以较高的知识人格去担当起教书的任务。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一再告诫弟子：“食勿求饱，居勿求安，敏于事而讷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要求他们注意随时随地去学习，达到合乎要求的知识水平，为将来从事“师业”奠定基础。他不仅有理论上的要求，还以“身教”来说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一再说明师的培养必须讲求学习的自觉性和毅力养成。

在道德方面，孔子认为教师还要注意道德人格的培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无论在道德观念还是在心理情感乃至行为方式上都要真正成为具有“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规范、具有“温、良、恭、俭、让”品行的君子。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德”，要求弟子们“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要‘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还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良好的道德人格再加上较高的知识人格，便具备了为师的资格。可见，孔子所倡行的“德”、“才”并重的人才培育标准，成为中华民族关于“师”及“师教”理论的源头，以至于到后来，人们直接概括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人们对师范的基本理念认识。

孔子认为，“为师”要乐于从事育人事业，以师业为志趣。所谓“诲人不倦”，就是热爱教育事业；而“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则表明认真施教是对人忠诚的表现，以不能讲学施教为自己生活的一大忧虑。他还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即不能按出身贵贱来待人，也不能分贫富差异而施教，只要施行了拜师礼，都要一视同仁，予以教诲，并且是毫无保留的奉献。在这方面，他的言行更可称为千古楷模，弟子虽有贫富贵贱的差异，但他都平等施教。即使是自己的亲儿子，他也像对待其他弟子一样施教，而不近厚远薄。以至于陈元问孔鲤跟父亲学习的情况之后，得出了“君子远其子”的结论（见《季氏》）。

再者，孔子告诫弟子为师应该学习和掌握正确的育人方法，这是育人的基本技能。如因材施教法，他曾通过讲授“仁”这一概念给弟子示范，颜回问“仁”，他曰“克己复礼”；仲由问“仁”，他曰“其言也仞”；樊迟问“仁”，他曰“爱人”。再如对子路听到所说就行动的习惯采取批评态度，而对冉有听到所说就行动的态度则采取鼓励态度。他告诉弟子，这是他对弟子们进行分别考察，并基本把握每个人的性格，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同一问题作不同分析或解答，并以此来告诉弟子这就是因材施教，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功。

关于启发式教学，他曾专门给弟子讲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关于启发式教学最早的典范例证。孔子认为，只有当不明白时才去启发，不能表达时才去诱导；还要注意引导弟子

“触类旁通”,讲屋之一角能使他们理解屋之其余三角。这样的讲授才是科学的，也会卓有成效。当然启发式教学也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孔子具体地谈了自己的运用，“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采用的是“叩其两端”的方法；当子贡同他谈论诗时，他赞赏子贡道：“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采用“告往启来”的方法；对颜回讲授“仁”则采用的是“循循善诱，欲罢则不能”、步步推演的方法。他就是这样通过讲授，一方面让弟子学到知识，另一方面从他的教学艺术中让弟子们更形象具体地感悟和把握为师的技能，以便使他们成为“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君子儒”。孔子的这一主张及做法,不仅成为中国历代‘教童子法’‘授业’的基本知识技能，也成为中国现代关于师范性阐释的理论依据，对当前乃至今后的师范教育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清朝末年社会状况与师范教育

清朝末年，山东的社会状况与国家的整体局面一样，一方面经济极度贫困，帝国主义修筑胶济铁路、津浦铁路，非但没有给山东带来经济利益，相反加重了帝国主义对山东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加深了殖民统治的程度；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种种方式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严禁所谓“异端学说”。由于山东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王朝不断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使山东政治更加黑暗。经济上的贫困和文化上的钳制，导致山东的文化教育仍然紧紧围绕着科举制运行，广大农村特别是平民子弟失去受教育的权力。19世纪下半叶，

江南部分发达地区已有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馆）等新式学堂出现，山东人民仍然在黑暗与贫困中挣扎，教育持续衰落。应该看到，1902年山东师范教育的创立，是山东大地一场观念与思想的革命，是在落后中的抉择与醒悟，加上国家政策变化后的推动，西方和发达地区进步文化的导引，山东师范教育遂顺应时势而诞生。

一、兴办新学对山东师范教育创立的影响

清朝末年国势日衰，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清朝政府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对内实行残酷的血腥镇压，对外则卖国求荣，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其中尤以山东受害最为深重。然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比较开明的贵族官僚以及追随他们的知识分子和富商买办，深感丧权之耻与辱国之痛，从民族感情与良知出发，开始冲破禁锢与封锁，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探索出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以达到救亡图强之目的。从早期的改良主义到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尽管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仍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从切肤之痛中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虚妄梦幻，认为应该放下架子到中国之外去寻找和借鉴有益的东西以富国强民。以洋务派为例，他们曾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实业技术，如兴办金融业、招商局、电报局以及制造轮船和枪炮、开通铁路等，从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应该说，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势贫弱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

正是基于对“西学”更深层次的理解，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教育的巨大作用，认为这是文化发展和人才成长的基

础。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提出学西学、设学校、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改良科举制度，到洋务派提出“新教育”、主张学西文：如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 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学西艺：如开设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技术学校——天津电报学堂、湖北务农工艺学堂等，开设最早的军事学校——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至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认为当时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和学术落后，所以救亡之道应该从改良教育入手，广为兴学。1898 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恳请光绪皇帝“立学亟亟”，认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本会(强学会——编者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校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梁启超更是把“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兴学校”,在 1896 年所发表的《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文章中他申述道：

>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以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不仅不遗余力地鼓吹、呼吁，并且还身体力行地去创办新式学堂，从事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据载：康、梁等人曾设立万木草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并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和强学会等，宣传变法主张，且卓有成效。统治者也不得不顺应时势，进行文化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育的部分改革，在所谓“新政”中诏示实行新教育，即废科举、停八股、设学部、立新学。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还规定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一律中西兼习；同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社庙不再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从而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体制中，注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血液，大大推动了全国各地新学堂的兴办建设，迈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新步伐。

应该说，在清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前期，思想活跃的江南地区新教育蓬勃发展，而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齐鲁大地则相对比较沉寂。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60年的时间里，山东教育仍循着封建教育的轨道悄无声息地循环往复。教育教学仍然围绕着科举来设置运作，儒学依然是教育内容的主体，即使像王筠（1784—1854，山东安丘人）这样一位极有见地的文字学家，也在他所创立的《教童子法》中，完全从封建教育的内容出发来评述立论。虽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89年在山东创办过威海卫水师学堂，1894年建立过烟台海军学堂，但都没形成风气，对山东新教育的萌生影响不大。

山东新教育的真正兴起始于20世纪初年，在清政府“革新”教育的诏令下达不久，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便着手将济南的泺源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并组织人拟出《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上报朝廷。此为各省新教育形势下创办新学堂的首倡者，亦开省办大学风气之先，故深得光绪皇帝的赞

赏，在1901年11月25日的《上谕》中予以表彰“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拟先于省城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俾初学易于速就，渐有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淳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达材本末兼资之道。”同时，将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的理念和思路在全国推广“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

如果说清朝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为山东师范教育发轫提供了外部动因的话，那么山东新学堂的建立，则为师范教育的萌发提供了具体的场景和内部动因。一方面，新学堂的建立需要数量较多的师资，而当时适应新教育的师资几乎没有。建立和发展师范教育，这在当时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张之洞和刘坤一于1901年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先折》中所说，在兴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教习少”甚至难于“经费巨”，办学经费再困难仍然可以由国家撙节和民间筹措解决，而“教习少”则无法在短时间内凑集，他们提出只有送人赴外“游学”或者“专习师范”才能解决。张、刘之论也正是当时山东初等教育所面对的难题和惟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因新学堂较之旧学堂在课程内容方面的变化，特别是西学内容的渗入，那些出身私塾的先生们实在难以胜任教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第一义”。也就是说，只有兴建师范学堂，才能培养出适应新式学堂需要的师资，这是发展教育刻不容缓的大事。另外，新式学堂的兴办，也推动了社会及教育界对师范办学的深度思考，大学教育从特定侧面为师范教育准备了理论和师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产生对师范的创设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没有勃发的新式学堂的建立，就没有清末山东师范教育的萌生。

二、清政府创办师范教育与山东师范教育萌发

山东师范教育的萌发是清末兴办师范教育潮流的产物。国家师范教育的兴办既为山东师范教育奠定了教育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必要的体制框架范例，同时也从兴办的方式方法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借鉴推进作用。

中国师范教育正式萌发于 19 世纪末期。其中，从理论观念上发出较早呼声的是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等人，他们依据当时兴办各类学校师资匮乏的情况，提出要尽快仿效“西国”、“探源师范”。1896 年 8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一文，其中一节便是《论师范》。文章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强调师范教育在发展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欲革旧习，学新智，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率先提出在我国正式创办师范教育的主张。在这之后，维新派人士叶瀚、汪康年等人以“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目的，在上海组织起促进倡导师范教育的“蒙学公会”，并出版旬刊《蒙学报》予以推波助澜。盛宣怀、张之洞、张謇等人也纷纷提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之务，既病求艾，相需以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显而易见，他们都把建立和发展师范教育放到整体教育的大战略中加以认识和论证，指出兴办师范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正是在此种社会舆论以及教育发展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

不得不顺时就势做出发展师范的教育改革。在 1902 年 8 月所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中,第一次正式规定在学制系统中设立与中等学堂并行的中学堂附设师范学堂,设置与高等学堂并行的师范馆。1904 年 1 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第一次将师范教育单独划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即把师范教育分为优、初两级。规定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两项教员者人焉”;优级师范学堂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学堂之教员、管理员”。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还提出‘:初级师范学堂为小学教育普及之基’,规定每个州县必设一所,但可先在省城试办,再逐步推广;并规定京师及各省城宜各设一所优级师范学堂。

关于将师范教育单独列为一个系统的问题,在当时的政界和教育界曾有较大的分歧并引发了一番争论。许多人认为中学毕业就可以当教师,无须划出师范这样一个独立系统:“或曰中学校程度与师范学校程度相等,其卒业生宜能充小学教员,何必师范生?”与之相反,当时的日本专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中学校专发达个人之心理,不及师范学校兼讲教人方法,能体察儿童之身体心思如何发达,得善诱之长,握施教之本业,故曰教人如治病,惟医者能知病源,惟师范能明教法也”。指出师范的优势在于除学习基本知识之外,还要专门学习掌握“教人方法”,而且这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教学专业技能,只有通过师范专门教育才能掌握。因为清末学制基本上是学习仿效日本的模式,无论是高师,如京师大学堂,还是师范学堂,如三江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堂,都聘有日本教员,或任总教习,或任教师。并且当时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师范

教育，主要去向便是日本，加之西方如法、德等国教育家的理论也在中国传播，从而在师范教育方面形成了强大的理论阵势和思维潮流，使当时的师范教育不仅取得了独立地位，也使教育思想、教学观念诸方面获得了有益启发，为我国早期师范建设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正是伴随着思想理念上的改变和学术理论上的探索，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正式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资培养的专门机构。1902年清政府又在京师大学堂中附设师范馆（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伦理、经学、教育学、中外历史、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课程。其后，又有张謇在江苏南通草创师范学堂等。

清政府早期师范创建大势与山东师范教育的初创关系巨大，其意义也非同寻常。其一，是作为政府指令，为山东师范教育的建立发展提供了政策要求；其二，清末师范教育创建的争议和实验，为山东师范教育创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和范式依据。从京师大学堂到江南师范的纷纷创立，山东教育界对于师范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也不断地加深，尤其对师范教育在整体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兴办师范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更是理解深切。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面对全国兴办师范的局面就曾坦言：“学贵善教，教先择师，东省学堂初立，尚少师范”。于是便依当时的定制，借鉴他地之经验，于 1902年在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山东师范教育由此奠基。

第三节　山东师范教育的正式创立

1902年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的建立,标志着山东师范教育的正式创立。尽管它的本意是为了选拔、培训师范留学人才，并非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但却迈出了山东师范教育史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师范教育不仅发展迅速，形成了多种师范教育形式并存的新局面，而且师范教育自身也不断规范和完善，从教育宗旨到教学内容，再到教育教学方法以及学习、借鉴日本教学模式，逐渐形成了具有山东特色的师范教育教学体系。

一、师范教育的创办及教育教学体制

从1902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师范教育体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有官立师范学堂，各府、直隶州办简易师范，各州、县办师范讲习所，民间办中学附设师范科等。各种学校隶属关系不同，办学条件、师资水平也有诸多差异，培养学生的层次目标也不一致，管理体制、管理水平、教学内容都不尽相同。其中师范学堂办学最为规范，为山东省师范教育的主体。

(一)师范学堂的创办及体制

1. 山东师范学堂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山东巡抚周馥为选送京师、保定及赴日本留学的师范生，考选廪生、增生和附生共104人，令山东大学堂暂设师范馆收容之，馆务由候补道陈思涛主持。这是山东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校址设在济南旧城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